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理论之声

实践真知

在新发展格局中推动中国与世界经济良性互动

□ 张宇燕 徐秀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推进,中国早已是世界的中国,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高度相互依存,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也紧密相连。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与时俱进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格局的战略抉择,也是塑造我国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作为一个致力于推动更高水平开放的大国,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将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上迈出更大更坚实的步伐,同时也能为世界各国共享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成果创造更多更好机遇。

以畅通国内大循环形成发展新优势

全球政治经济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逆全球化现象加剧,有的国家大搞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良性互动也受到影响。在此背景下,我们需把发展立足点放在国内,更多依靠国内市场推动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国内大循环的主体作用,同时为国际循环输入持续动力。

先看国际上,受各种逆全球化政策和行动的影响,传统国际循环明显弱化,国际贸易和投资增长乏力。加之新冠肺炎疫情和一些国家保护主义政策的影响,2020年国际贸易与投资增长都出现大幅下滑。再看国内,我国国内大循环的基础日益巩固。目前,我国已建立了完善的国内产业链,拥有14亿多人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突破1万美元,是全球最大和最有潜力的消费市场,经济增长空间十分广阔。同时,支撑经济发展的科技实力稳步提升。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实施,科技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深化,重大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面向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必须将发展的立足点放在国内,通过激发国内市场活力和推动高新技术的自主创新,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形成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理论在线

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 刘昂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也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强调,“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提出“要针对主要矛盾的变化,理清工作思路,推动减贫战略和工作体系平稳转型,统筹纳入乡村振兴战略,建立长短结合、标本兼治的体制机制”,并作出重要部署。这为各地区各部门接续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持续推进减贫工作,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无论是立足当前,加快补足全面小康“三农”领域的突出短板,还是着眼长远,大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都需要以更大决心、更大力度推进脱贫攻坚,确保取得最后胜利,为以后的更好发展打下坚实基础。乡村振兴战略是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治本之策,科学有序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振兴,能不断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全面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让亿万农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不断加强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顶层设计,并将相关工作纳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行统筹安排,也是更好推动乡村振兴的题中应有之义。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纳入“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提出“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要求。这说明,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之后,接续推进

还要看到,我国国内循环的带动作用在不断提升。近年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尽管受到疫情冲击,中国经济依然表现出较强的韧性。据2020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计,2020年中国经济增速远高于世界经济增速。当前,我国经济正呈现持续向好的增长态势,而随着经济实力的持续增强,我国对外部环境的塑造力也将持续提升。外部环境不再主要取决于外部已有的基础或条件,而是更多取决于我国自身的选择和行动。

以国内国际双循环优化全球资源配置

中国乃至世界发展的成功实践已经证明,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高水平开放是国家发展繁荣的必由之路。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中国改革的脚步不会停滞,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因此,新发展格局绝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我们着力构建新发展格局,需更好吸引全球资源要素,进一步优化全球资源配置,在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促进世界经济持续增长。

更好吸引全球资源要素。经济全球化使资源配置从一国内部扩大到全球范围,在此过程中,全球资源配置的效率不断提升,并推动世界经济持续增长。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的历程,也是资源配置效率逐步提升的过程,中国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充分反映出中国市场较高的资源配置效率。推动形成宏大顺畅的国内经济循环,实现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就能更好吸引全球资源要素,这本身就是促进世界经济增长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之一。据商务部发布的数据,2019年中国吸收外资占全球跨境直接投资(FDI)的比重为9.2%,今年有望继续稳中趋升。“十三五”时期中国吸引外资总规模将达6900亿美

元左右,年均引资规模比上一个五年时期增加超100亿美元。

更好分享中国发展机遇。构建新发展格局不是追求中国发展的“一枝独秀”,而是要同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一方面,对外开放是中国的根本国策,任何时候都不会动摇。中国向世界大开放之门,欢迎世界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顺风车。同时,中国还积极主动扩大进口,搭建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平台,不断提高进口便利化水平。另一方面,中国积极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坚持促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的全球发展。

更好促进世界经济良性循环。新发展格局要求更好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促进世界经济的良性循环中实现更加强劲和可持续的发展。在贸易方面,中国是全球最大贸易国和第二大进口市场。2019年,中国进出口总额为31.54万亿元,进出口、出口、进口规模均创历史新高。同时,中国已经成为120多个国家和地区主要贸易伙伴。在投资方面,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外资流入均居全球第二,双向良性互动效应日益增强。商务部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1369.1亿美元,2.75万多家境内投资者在全球188个国家(地区)设立4.4万家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向投资所在地缴纳各种税金总额达560亿美元,雇用外方员工226.6万人。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将进一步促进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融合,优化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

以高水平开放推进国内国际市场对接

新发展格局是国内国际市场更加深度对接的发展格局。一方面,要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加强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环节的国内市场依托,打通国内经济循环的堵

点,不断创造对接国际市场的基础和条件;另一方面,要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推动构建全球互联互通伙伴关系,打通国际循环,实现共同发展。

一是打通国内经济循环堵点。实现国内大循环的畅通,关键在于找准并打通国民经济各个系统、各个环节的堵点,从根本上消除影响内需潜力释放的各种障碍。在宏观层面,针对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各个环节存在的连接不畅等问题,要精准施策、逐个突破,形成相互衔接、有机联系、全面畅通的循环链条;在微观层面,对企业产品设计、生产、运输、销售、存储等环节存在的各种限制和障碍,要依法清理,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同时,还要形成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国内统一市场,打破妨碍不同区域间企业公平竞争的各种障碍。

二是夯实国际互联互通基础。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关键在于推动全球互联互通。互联互通,既包括硬件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也包括规则、机制和平台等软件与人员交流的互联互通。为此,必须依托高水平的全球共同开放,推动全方位的全球互联互通,帮助相关国家打破发展瓶颈、破除阻碍互联互通的各类障碍,不断为世界经济

增长和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创造条件。三是注重规则等制度型开放。制度型开放是对接现有国际通行规则、不断推动构建以规则为导向的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开放,是我国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新阶段要求的必然选择。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国际规则的普遍适用性的提高,国际规则日益成为决定经济全球化发展方向的重要影响因素。对此,我们要不断夯实适应国际新规则的国内基础,化挑战为机遇,将自身实力转化为制度性话语权,不断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作者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生产性服务业涉及农业、工业等产业的多个环节,具有专业性强、创新活跃、产业融合度高、带动作用显著等特点,是全球产业竞争的战略制高点。其中,进一步增强生产性服务业对现代农业的全产业链支撑作用,着力推动服务结构合理、专业水平较高、服务能力较强、服务行为规范、覆盖全产业链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健康发展,对于培育农业农村经济新业态、更好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是贯穿农业生产作业链条,直接完成或协助完成农业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作业的社会化服务。具体来看,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是面向农业产业链提供生产性服务的服务业,是直接从事替农民或帮农民耕种防收的系列服务,是现代农业生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发展现代农业与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一环。从国际发展经验来看,农业生产在更大范围实现联合与合作是必然趋势。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能够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加速普及现代农业装备和技术手段,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和科技贡献率;能够实现资源要素高效配置,通过服务规模化提升生产规模化、规范化和标准化,在一定程度上化解生产经营风险;能够促进生产经营主体优势互补,使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推动农业生产经营降本增效、实现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我国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进程不断加快,成效显著。2017年至2020年,中央财政累计投入155亿元支持以农业生产托管为主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截至2019年底,全国农业生产托管面积超过15亿亩次。当前,我国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正逐渐朝着公益性服务和经营性服务并存、综合性服务与专业性服务共生、不同类型优势互补、不同模式相互衔接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方向发展。

(二)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日益提高,但也要看到,发展中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解决。一是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尚处于起步阶段,具有较为明显的短板和弱项。具体表现为:服务主体规模小、实力弱,大型服务企业占比较低;出于交易成本的考虑,服务对象往往重大轻小,对小农户的带动仍需加强;服务监管相对滞后,服务标准、规范、合同、价格、平台等方面的建设亟需跟进。二是农业生产性服务业自身发展尚不平衡。一方面是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平衡,总体来看是在种植业方面发展快,养殖、种养结合以及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等方面发展明显滞后。同时,种植业内部也存在发展不平衡现象,大宗粮棉油糖作物发展快,其他则发展较慢。另一方面是不同地域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平衡,平原地区发展快,而丘陵、山地等地区发展慢。三是政策层面还需进一步加强配套和衔接。比如,原有的农机大范围跨区域流动作业的效率较高,但是对于跨区域作业的更好实施形成约束,如何发挥好二者的优势、不断提高作业效率是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又如,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趋向于生产、生活全覆盖,需要实现城乡一体的互联互通,对此也需要加强构建城乡共享资源平台和渠道。在这些方面都需要做好具有针对性的配套安排。

(三)

当前,我们正处于“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期,我国有独特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发展优势和机遇优势,经济社会发展有诸多有利条件。我们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尤其需要更加重视农业的基础性地位,重视和支持农业生产,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推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在此进程中,更好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是一个重要抓手,需切实发挥其在推进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等诸多方面的重要作用。对此,应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在原有投入专项经费的基础上,进一步整合相关项目与资源投向,着力将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作为新兴战略性新兴产业予以加大扶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带动小农户,发挥好政策引导作用,同时将社会资源的撬动作用激发出来,鼓励推行符合发展实际的补助资金退出机制;推进土地保护性利用与规划整理相结合,重点要恢复和培植地力;重视培育合作社、农业企业、集体经济组织等各类服务主体,为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增动力、添活力;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和“生产性服务业统计分类”基础上,制定“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统计分类”标准,更好指导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做好顶层设计,统筹农业、农村、农民,推动服务业实现覆盖城乡的一体化发展。

(作者系中国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农村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帽,但一些地方的整体发展水平依然相对较低,依然需要帮扶和支持才能实现自我发展、主动发展,而且这一情况还将存在较长一段时期。需要认识到,摆脱贫穷只是减贫事业的一个阶段,在新的发展阶段,在推动相对贫困地区和群众更好发展上,工作重点不能转移、投入力度不能下降、干部精力不能分散。对此,要在激发内生动力上下功夫,使已经脱贫但仍然相对贫困的地区不断增强其自我发展的能力。特别是要进一步发挥当地产业的作用,推动扶贫产业向特色产业转变,将推动产业发展的工作与推动乡村产业振兴联系起来,以产业的持续壮大,增加当地的经济实力和活力,提供更多更稳定就业。同时,需着力推动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等方面的发展,整体提升相对贫困地区的发展水平。

再次,要研究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推动减贫战略和工作体系平稳转型。今年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我国将有1亿左右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实践证明,我国的减贫战略和工作体系是有力有效的,进一步推动相关工作,就要总结并且用好相关经验,发挥脱贫攻坚体制机制作用,深刻认识下一阶段减贫工作主要矛盾的变化,理清思路、找准路径,使减贫工作与推动乡村振兴协同发展、一体推进。对此,关键是要建立长短结合、标本兼治的体制机制,做好不同发展阶段的体制机制衔接,在推动乡村振兴的实践中不断将减贫治理引向深入。

同时,可考虑降低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

其次,要建立适应消费升级的多元化供给体系。大力发展既满足人民生活品质改善需求,又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的服务消费,进一步放宽教育、医疗、养老、文化、体育等领域的准入限制,支持社会力量增加相关服务的有效供给,同时促进商品消费升级换代。

再次,要完善放心、便利、安全的软硬件环境。特别是要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深化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积极布局和建设5G、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型基础设施,提高城乡消费基础设施的智能化、网络化水平以及配套连接和利用效率。

最后,要完善市场治理的基础性制度。推进标准体系建设,加强新型消费领域的法律规范。同时,还要建立健全包容审慎、科学有效、公正透明的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体制机制。(肖伟)

促进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创新发展

□ 王玉斌

撷英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刘涛:

消费市场将出现三个标志性变化

近年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逐步显现。中等收入群体及新生代年轻人群体等成为促进消费扩大和升级的中坚力量;各类新兴技术快速发展,应用场景不断拓展,有力地推动了消费市场创新发展。

未来一段时期特别是“十四五”时期,我国消费市场将进入“由大变强”的新的发展阶段,预计会出现三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变化,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助力。

一是消费市场规模有望跃居世界第一。2019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41万

亿元,接近排在首位的美国。“十四五”时期,在居民消费增长的带动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还将持续较快增长,这将为畅通国内大循环提供强劲动力,也将形成对国际商品和服务的巨大吸引力。

二是服务消费将成为居民消费的主体。2019年,我国居民服务消费支出比重已达45.9%,预计“十四五”时期服务消费的比重将突破50%,这将对提高相关服务供给体系的适配性起到重要导向作用。

三是城乡消费差距有望持续缩小。2019

年,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差距已缩小到2.1倍。随着“十四五”时期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加快发展,预计农村居民消费将延续较快增长势头,与城镇居民消费的差距将进一步缩小。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促进消费”。在具体工作中,我们要基于消费市场出现的新变化,着力完善相关政策体系。

首先,要提高居民特别是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需进一步加强对城乡居民数字素养的培育,促进更高质量、更充分的就业,健全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要素参与分配的机制。